

多元文化下的徬徨：馬來西亞華族知識分子的困境

何國忠

(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講師)

一、前言

什麼樣的人才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這是個爭論已久的問題。由於教育的普及，爲了突出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功能，一般而言，我們都會認爲知識分子除了是接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以外，還必須是對人類與社會有一貫熱忱的關懷與批判的人格特質，韋伯 (Max Weber) 認爲知識分子是人類追求理想的代表，在文化價值上具有特殊成就的人。^①希爾士 (E. Shils) 內心中的知識分子則是指社會中一群關心人類、社會、自然和宇宙的人。^②余英時認爲用中國的標準來說，具備了類似「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識分子。^③不管社會怎樣變化，文化背景差異如何，大部分的人顯然都要求知識分子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們是人類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

對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變遷有研究的人大體都知道，要想在馬來西亞找一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爲個案研究，的確寥寥可數。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裏找不到一位像嚴復、梁啟超、魯迅或胡適那樣介於思想和政治的知識分子，也找不到像熊十力、梁漱溟一生爲中華文化尋找出路的儒者。早期華人南遷的時候，知識水平一般不高，但是這幾十年間，受過相當程度教育的人比比皆是，爲什麼這塊土地總是不容易出現一些頭角崢嶸的思想性人物？爲什麼知識分子極難形成一個有力而又明顯的獨立階層？這樣的人文傳統爲何始終建立不起來？

註① Gerth &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Y.: Oxford, 1968, p. 176.

註② Edward Shils, "Intellectuals" in D. L. Sills (ed), *Intellectuals Encyclopedia of Sciences* (7), N.Y.: Oxford, 1968, p. 176.

註③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五年，自序，頁三。

二、文化傳承的困惑

從華人的內部而言，沒有共識可說一直都是華人心頭的鬱結。王賡武教授在他那篇極為著名的馬來亞華人的政治一書中，將早期的華人分為：一、以大陸為認同目標；二、講求實際，關心貿易，基本上以低姿態面對政治問題的華人，他們滿足於在既定的政治集團的管理下工作；三、對馬來西亞有某種忠誠，其成員以峇峇及英屬海峽殖民地華人為主。^④王教授點出了華社當時的困境，早期華人在思想上顯然各有依歸。但是新一代在本地化的教育洗禮之下，大體已經克服土地認同的危機。今日馬來西亞華人可說都以馬來西亞公民自居，將此地當作他們的祖國，但在思想上，沒有共識還是一仍舊貫。

從教育的淵源來看，早期的華人可分為三類，一是純受華文教育，一是純受英文教育，另外一類是小學接受母語教育，中學到英校就讀。教育背景不同，是令華社不能出現共識的其中一個因素。自從馬國政府推行馬來語國語政策以來，馬來西亞再也沒有以往的接受英文教育者。目前華人還是有三種選擇：一是純粹受馬來文教育，二是純粹受華文教育，三是小學受華文教育，中學往國民學校就讀。^⑤

目前的華人社會受英文教育者仍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以馬華公會來說，在他們的四位部長中，其中兩位是完全没有受過華文教育的。雖然作為學校媒介語的英文已經被馬來文所取代，但對於那些沒有受過中文教育者，華人彼此之間還是以英語交談。其情況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原因顯然和崇洋的心理有關，另外也有人認為華人心理一般有這樣的潛意識：覺得用馬來文就是傾向要成為馬來人了。^⑥從這裏可以稍稍看出華人和馬來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自從英校被改制為馬來學校後，許多家長改變過去將孩子送到英小的態度，將自己的孩子送到華小。^⑦目前大約百分之八十八的華人是將孩子送入華小。^⑧華人一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掌握最基本的母語教育。小學修完以後，家長可以將自己

註④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pp. 8~9. 中譯見姚楠編譯：《東南亞與華人》，北京友誼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頁一五九~一六〇。

註⑤ 教育背景的不同顯而易見會導致華人出現不同的心態，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閱 Tan Chee Beng, "Nation - Building and Being Chinese in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in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46~155.

註⑥ 陳志明，「華人文化與國家文化（訪問稿）」，吉隆坡文道月刊，第二十九期，一九八三年五月，頁九。

註⑦ 參閱陳綠漪，「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展」，林水燦、駱靜山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吉隆坡留台聯總，一九八四年，頁三〇〇~三〇一，三二三。

註⑧ 見全國華團領導機構於一九八三年向文化、青年及體育部提呈有關國家文化備忘錄摘要，又見林良實刊於星洲日報，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談話。

的孩子送入以國語為媒介語的政府中學或是由華人自己經營的獨中就讀。目前就讀獨立中學的學生人數大約有五萬五千人，而政府中學的華族學生大約有二十三萬人。^⑨

華人的心理是極容易讓人了解的。他們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會忘本，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够在這塊多元種族的土地上生活得更好。馬來文是國語，是官方語文；英文是國際語文，在馬來西亞的工商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當然不能放棄。通曉三種語文是一般家長對子女的期望。

整體而言，有許多老一輩的人對中華文化還是亦步亦趨，這是由於他們是傳統華教出身。新一代的馬來西亞華人的中國歷史文化屬性是越來越淡，對文化傳統的眷戀已經淡薄，但是新一代也不見得就對中華文化抱著一種事不關己的態度。有許多新一代的華人對文化傳承仍有重大的使命感，其中一部分更是抱著極為濃厚的憂患意識，我們可以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為例，其學生的數目和早期相比可說有極為顯著的增加，目前中文系有許多學生的成績事實上是可以用選修其他更有「錢途」的學系，但他們仍然以中文系為第一志願。^⑩再以馬大華文學會的情況而論，其學員的活動層出不窮，幾乎可說是馬大其他十個學生組織的總和，裏頭夾纏的文化情結是相當明顯的。

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與馬來人政治發展息息相關。國家文化政策雖然在精神上尊重多元傳統，但官方在落實上却出現了極大的偏差。對於馬來西亞的許多華人而言，華人文化是重要的，教育是傳承文化最主要的環節，政府若有不利華文的政策出現，我們可以看到華社的激烈反應，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推行以後，一向在馬來西亞經濟發展裏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華人，已經失去了主導的地位。這種挫折感，使得一些華人對文化的發展不敢再掉以輕心。但是在華人內部所面對的最大的問題顯然和中國近百年來的問題一樣：中華文化應該走什麼樣的路？

我們可以發現華社在文化的傳承上所出現的不同心態。基本上，所謂華社的意願，就是捍衛華人的權益。在維護華教的旗幟下，華人對確保華小不變質和發展獨中絕無異議，因為華社十分清楚，沒有華教就沒有華族及華族文化。但是一論及如何捍衛華人文化，華人的觀點却始終莫衷一是。

有一部分華人認為華社應該了解馬來西亞的國情，從多元的角度來看待文化問題，華社不應該要求過多，要適可而止，

註⑨ 南洋商報（馬來西亞），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四日，第十三版。

註⑩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分語言文學組和社會文化組，語言文學組主要是以中文為教學媒介語，要進入這組的同學必須擁有馬來西亞高級文憑（相等於劍橋大學所辦的 A LEVEL）的華文程度；社會文化組則是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對象是華文程度較低的學生。中文系語言文學組是全馬來西亞研究中華文化的最高機構，語言文學組的學生在一九六五年（那時稱 A 組）的總數是十六人，一九七〇年是三十五人，一九七五年是二十一人，一九八〇年是一三五人，一九八五年是一九九人（一九七七年、一九八八年稱古典組），一九九〇年是二六三人。

要不然會弄巧成拙。另有一些人認為，我們應該有發展文化的權利，因為憲法明文規定華人可以自由發展自己的文化。前者認為後者的作法將讓華、巫兩族產生對抗，後者却認為前者的讓步將使文化的傳播更加迂迴，無疑是自願出賣自己民族的靈魂。在政治衝突和價值混淆的盲點上，兩者極難找到銜接之處。例如由馬華公會創辦的拉曼學院不願意辦中文系，雖然引起民間極大的批評，民主行動黨更是譏諷馬華在拉曼學院沒有主權，但馬華公會顯然也有他們的解釋。他們擔心這樣做會引起馬來人的不滿，影響政府對拉曼學院的撥款。馬華公會總會會長林良實不止一次在報章上說，他極為心痛有大约八千名可以進大學的華族學生，由於政府施行種族配額制度而被排斥在校門之外。事實上，對於大部分馬來西亞人民來說，只要有機會進入大學，大家已經心滿意足，對他們來說生活還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求生活上的舒適，和文化的傳承是兩回事，華社在這樣的作法是否明智，這種論爭顯然將無止無休。我們再拿另外一個例子來說明這樣的困境，華人關心華文教育，可是對於大部分的華人來說，一般只要求基本的書寫和會話。從報章的言論我們大體可以看到這種趨向，許多人認為要推廣中文，就不應該讓中學生學習太多的文言文。根據他們的看法，艱澀難懂的文言文會導致華族新生代放棄選修中文，目前中學華文課本文言文大量的減少就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事實。^⑪

沒有共識，又何來對策？也就是說，文化傳承根本就没有準據和方向可言，這是知識分子最迷惘的地方，在還沒有解決如何保衛民族權益之前，華人首先面對的是如何為自己的靈魂和民族定立方位。由於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答案，華人社會裏頭因而種下了不穩定和不安定的因素。當不利華人的政策出現時，在尋找對策的過程中出現意見分歧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在「獨立大學事件」中馬華和董教總的對立是如此，^⑫而獨中辦學方針更可以看到華社對自己前途一種錯綜複雜的心理。^⑬因此，知識分子雖然能以大無畏的勇氣批評時政，但是理直氣壯並不表示就能獲得全體華人的支持。大體而言，華人是相當保守的。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情況一向都傾向於維持現狀，都希望能夠賺錢養家，能夠發展，雖然許多人認為政府的許多政策對華人不公，偶爾會發一些不滿的聲音，但華人大體都維護目前的體制。知識分子本來的工作是做些社會教育，啟蒙群眾，尋求社會、政治的改革，但是假如他從文化角度替華人爭取權益，在土著至上主義根深柢固的馬來西亞政治裏頭，往往會被

註⑪ 根據目前馬來西亞教育部課程發展中心的規定，文言文在華文課本的比例是預備班及中一：一〇%；中二及中三：二〇%；中四及中五：三〇%，可見學生所讀的文言文極少。

註⑫ 參閱謝詩堅，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檳城：出版社不詳，一九八四年，頁一三三～一三四，二九三～二九五。

註⑬ 獨中強調三語並重，但獨中的教學媒介却出現論爭，有人認為獨中的課程應該採用馬來文、英文的課本，用華文教學，以讓學生能接受華文教育又有能力參加政府考試，也有人認為華人辦校，用華語是名正言順，而且由華小過來的學生不會因為語文的掌握而影響了吸收能力。參閱「媒介語大統障礙」，中國報「獨中荆棘路」系列（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第十篇，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其他種族視為破壞各族和諧者，最終的局面可能也不是華社要看到的。

這種現象常常讓知識分子產生極大的無力感和失落感。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雖然在滾滾的政治洪流裏頭要面對許多困難，但是在民族和國家的觀念上並不會起太大的衝突，民族主義也是愛國主義，動機和目標一目了然。^⑭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民族主義却和國家主義起了衝突，要維持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色彩，自然更增添了一層障礙。

三、文化溝通困境

從獨立到現在，馬來西亞華人在生活上可說有了許多轉變，生活好了許多，中產階級也增加了不少。從西方的發展來看，民主的體現和中產階級的普遍有很大的關係，但由於馬來西亞的土著和非土著經常對立，許多事情自然不能循序漸進。目前馬來西亞各民族的報章都有各自的重點。華文報章普遍報導的都是和華人有關的事，而馬來報章報導的主要也是以馬來社會為主，英文報章的新聞則是走馬來西亞人的路線，但基本上却傾向政府，對於探討華人問題，它的興趣不濃。我們以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九日柔佛古廟圍牆被拆作一個例子。這件事情引起了華人極大的震撼，各華文報章都以顯著版位報導這件事，英文報章對這件事情輕描淡寫，馬來日報則隻字不提。^⑮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困境。事實上，在華人社會中知名度極高的人，可能在馬來社會中無人知曉。

知識分子的訴諸對象本來是政府，他的收訊人是當權派，對於華社問題，他們所訴諸的對象應該是馬華公會，但是馬華公會的表現却使他們對這個管道失去信心。長久以來，馬華公會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和巫統對話和談判的角色，有時它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個反對黨，監督巫統的行政。馬華公會雖說是代表華社，最大的華人政黨，但事實上它只獲百分之二十華人的支持，明顯的出現了「權威危機」，沒有使人心悅誠服的公信力。^⑯因此，除非知識分子以馬來文發表他們的看法，讓真正的當權人直接看到，要不然想對政府起監督的作用，不免要經過許多曲折顛簸的路程。但華人要在馬來報章爭一席發言之地却是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在實踐中極難找到著力點，古典民主理論家盧梭所提倡的借「參與決策」來達成「健全政府」的目標，當然就無從落實。

註⑭ 近代中國民族思想是以文化為出發點，注重文化的異同遠大於民族的異同，所以漢人能接受滿人，他們的敵我之分是將中國與外國對立。參閱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九年，頁二二，二九。

註⑮ 參閱 Tan Chee Beng, "Building a Malaysian Image: Chinese Newspaper in Malaysia," *African Monthly* (Penang), 1992: 12(2), pp. 10-14。

註⑯ 何啟良，「權威危機和協商困局」，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青年團主辦「當代大馬華人政治辨思學術研討會」講稿（即將出版）。

在馬來西亞，華族知識分子若要發揮自己的理想，顯而易見的是他必須掌握三種語文。我們常說馬來西亞的華人有語言天分，能够掌握好幾種語文，事實上這種過程是苦不堪言的。通曉三語並不是一件難事，但要精通以致書寫流暢、辯才無礙，那就不是人人都可以辦得到的，這是知識分子要面對的一個先決困難。而且魚與熊掌，不能兼得，華社因為要學太多的語文，母體文化的掌握自然大大地被削弱，許多傳統在歷史的洪流中終於被忘却，這似乎是一個兩難的局面。我們可以拿到台灣留學的學生作一個比較來看其中出現的困擾。到台灣留學的學生一般都是修完獨中課業以後才過去的。從中華文化的熏陶而言，這些人所受的影響當然較為全面，對中華文化有較深刻的體會。相對地，他們的馬來文自然較為遜色，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對馬來西亞中華文化的前景極為悲觀，另外由於他們的文憑不受承認，這種現象難免造成他們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¹⁷華人和馬來人雖然有許多避不開的交往，但是真正從事文化溝通和感情交流工作的人却不多見，兩大種族很少在這方面進行對話和合作，其結果是馬來人極難了解中華文化。在這種情況下，各族之間常出現誤解就不足為奇了。馬來人普遍上不能了解華人的感受，因此不止一次出現「華人為什麼總是要求那麼多」的言論，在一九九〇年大選過後由於華人的許多選票都投給了反對黨，引致巫統青年團極大不滿地問華人到底要什麼？

從溝通的角度而言，我們可以發覺以馬來文書寫有關中華文化的著作是少得可憐。翻譯工作本來應該是雙向的，通過雙方平等相待之情，努力付諸實現。但由於一般情況只有華人懂得馬來文，馬來人不懂得中文，這方面的重擔當然落在華社的肩頭。華社在這方面顯然也不够積極，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並沒有大力支持，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和華社一向對人文的忽略有關。

華社雖然重視教育，但是大學畢業以後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可說是少之又少，特別是人文學科更是少人問津，這當然是關係到出路的問題。馬來西亞雖然有七間大學，但是只有馬大設有中文系，從這裏可以看到中華文化要在馬來西亞深化和拓展所面對的障礙。另外，華人要在大學覓職顯然並不容易，我們知道，大學一般是知識分子的温床，就如懷海德所說的「大學的存在是爲了結合老成與少壯以從事創造之學習，而謀求知識與生命熱情的融合」。¹⁸但馬來西亞各大專的華族講師在比例上是極少的，而馬大校長賽胡先阿拉達斯由於委任非土著爲院長而引起爭論，並於一九九一年一月中被終止職務的事件，¹⁹

註17

我們可以從文學的領域審察這個問題，例如林綠認爲要在馬來西亞發展華文文學是困境重重，他因此最後投身到台灣，即他所謂的捨棄支流走入主流。見林綠，林綠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四年，頁五七、六一。另外，前薰風主編，目前在台灣中山大學執教的張錦忠對馬華文學的發展也極爲悲觀，並認爲除非馬來西亞的語言教育有所改變，否則華裔作家有朝一日要面臨失聲危機，無法用母語來表達自己。見張錦忠，「馬華文學：離心與隱匿的書寫人」，中外文學（台北），第十九卷，第二〇期，民國八十年五月，頁三四、四六。

註18

引自金耀基，大學之理念，台北時報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二年，頁二。

註19

南洋商報（馬來西亞）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社論。

更讓許多知識分子心中出現陰影。

但是華社人文傳統不能建立的原因顯然也和華族只重視短期的「實效」有很大的關係。華社這幾年來的文化活動大體相當熱鬧，但是華社對文化的推動，一般都缺乏向下深耕的氣魄，華社非常缺乏和研究相關的機構。在這種情況下，要學術人員從客觀的角度進行多元積極性的探討和思考，進而指導社會，自然是極為困難的。華社目前雖然有許多大學以外的熱血之士對政治維持高度敏感，關心社會，通過報章提出他們的看法，但由於他們大都不是純粹的觀念人或文化工作者，在知識參考的憑藉上，難免出現不足的現象，水平是有限的，我們從報章上的輿論大體可以看到這方面的困境。也就是說，由於缺乏學術人員的參與，許多矛盾自然不能得到理論上的澄清。馬來西亞華族固然有許多專業人士，但他們重視物質生活高於一切。即使在大學教書的華人，一般也沒有發揮他們在輿論上的影響力。他們不能像西方知識分子一樣，可以在自己的領域有建樹，又可以通過輿論和壓力集團影響、干預國家政治生活的重大決策。在輿論上，華社的確是出現了高度的沈悶氣氛，報章似乎是唯一傳播這方面聲音的工具，人文雜誌少得可憐，以批判時政為主的書籍更不常見。知識分子只能零零星星發揮一些催發的作用。

在嚴重不利知識分子生存的大環境中，主導的決定因素是掌握在強大的政治權力擁有者的手中。當整體環境不能提供一個更高的人生出路，知識分子是很難維持自己的一種特性。許多原本對華族文化憂心忡忡的知識分子最後都另尋出路。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知識分子若是關心政治，他最終的路子往往就是投到政黨裏頭，只有這樣他的聲音才能直接在國會中傳達，華團的三結合、兩線制，都是在苦無對策下知識分子的最終歸宿。⑳事實上知識分子投入政黨，也有他們的苦惱，反對黨本身就面對自己極難超越的困局，㉑投身執政黨也不見得就能發揮知識分子原有的理想。例如在一九八七年的時候，國民大學副教授陳祖排代表馬華出來競選，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論爭。學者從政本來是小事，但它却成爲華人社會討論的焦點，其中一個原因是，學者從政的例子太少，使得大家對學者從政的討論產生莫大的興趣，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大家對政治的信心不强。巫統在國陣裏的議席遥遥領先，政府的一切操作都以巫統爲主，馬華的行事往往都看得看巫統的臉色，在協商的制度下

註⑲

一九八二年董總主席林晃升提出華人朝野政黨和民間團體應形成「三結合」，以突破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當年董總的郭洙鎮和許子根等就爲了這種理想參加民政黨，「打入國陣，糾正國陣」是當時華團和一些知識分子的理想。到了一九八六年，又有人提出了兩線制，希望反對黨聯合陣線的成立，能够打破國陣特別是巫統的政治壟斷，許多知識分子就在兩線制的號召下加入了民主行動黨。

註⑳

基本上，馬來西亞選舉制度的種種運作已經否決了反對黨奪取多數國會或州會席位而執政的可能。參閱何啟良，「政治反對在大馬」，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新山中華公會主辦「當代大馬華人政治省思研討會」講稿（即將出版），有關民主行動黨的困境，還可參閱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對民主行動黨的分析，見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 March 1992, pp. 24-27.

多元文化下的徬徨：馬來西亞華族知識分子的困境

，很多時候都不能從心所欲。就如前華社資料研究中心主任柯嘉遜所說的一樣：「下次當不民主的法案要在國會通過時，他們打算怎樣？」²²而那些對政黨沒有信心的人，最後可能會選擇窮則獨善其身的方式，與馬來西亞華人政治和文化志業相忘於江湖。這種情形相當普遍：關懷華人政治、文化的人，經常不能一以貫之。

四、自力更生與文化拓展

由於馬來西亞政府對中華文化的發展並沒有多大的興趣，華人要發展自己的文化，一般只能自力更生。除了政黨以外，目前華人社會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華團。所謂華團，包括了血緣性和地緣的傳統華人組織、以商業為由的華人組織、以教育為奮鬥目標的董總、教總等。華社的聲音一般都是通過華團表達。華團在鬥爭的過程中走過許多崎嶇的道路，嘗試過許多不同的方式為華人爭取權益，從六十年代馬華、董總、教總「三大機構」的成立和分解；一九七二年超越黨派的「華團領袖大聚會」開展和落幕；八十年代為了「獨立大學」和政府對簿公堂；茅草行動前的馬華、民政、民主行動黨和十五華團在天后宫的大聚會等事件中都可看出他們的煩惱。²³最近華人社會出現所謂「協商」和「施壓」的爭論，可說是這一連串事件發展的另一個面向。華團和知識分子之間，一向就有極為微妙的關係。由這個「協商」和「施壓」的事件，我們可以更加清楚看到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另一個困境。

華團的許多領導人都是商人，為了在商業上和政府維持良好的關係，在利益的衝突之下，難免出現一些和知識分子背道而馳的聲音。我們以目前中華大會堂聯合會的操作作為一個例子。中華大會堂聯合會可以說是華社最高的華人組織，中華大會堂聯合會的委員會是由全國十三個州的中華大會堂及其平行組織所選出來的。目前中華大會堂聯合會走的是「協商」的路線，也就是說，他們儘量和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他們認為這樣做更加會有效益。但是有許多人却覺得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而放棄了壓力集團的角色。我們在報章上看到許多人不滿意中華大會堂聯合會的領導方式，但問題是，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不屬於任何華團，他們的言論只是出自知識分子的一種直接反應或關懷。也就是說，許多重要華團領導人的選選，知識分子在實質上是没有投票權的。華團在華社有極大的影響力，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報章上每天都有報導他們的言論看得出來，知識分子的言論在比較之下則是相形見拙。華族知識分子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所處的附庸地位是極為明顯的，他們一直無法形成一個有力的階層，有時甚至讓人感覺他們只是扮演監督華團的角色。

註22

有關陳祖排選舉的論爭，可參考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編，知識分子參政——務邊補選論爭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一九八七年。

註23

有關華團在馬來西亞政治洪流中的鬥爭，可參閱Ho Khai Leong, "The Malaysian Chinese Guilds and Associations as Organized Interests in Malaysian Politics,"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2.

問題的產生在於華社有許多領域需要自力更生，目前馬來西亞華人在文化的許多領域都需要進一步的開拓和深化，沒有這些商業鉅子的協助情況會如何？華小、獨中的經費要從何著手？我們看到許多商人在不同的華團裏擔任領導人，就可以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了。對於華社而言，沒有錢，任何的活動都難以進行。這裏頭清楚顯示了華社內在的矛盾和衝突。

五、種族氣氛下的文化鬱結

基本而言，大家都認為華人權勢的不振，主要是和華人本身自挖牆角，勇於內鬥有關，無法團結導致華人力量的分散。以三個華人色彩最為濃厚的政黨在一九九〇年的表現而言，馬華公會獲得下議院的十八席，民主行動黨二〇席，民政黨五席。這個實證告訴我們，三個政黨的總和是大不如巫統所得的七一席，更何況以馬來人為主的政黨還包括四六精神黨，執政吉蘭丹州的回教黨等。華人政治勢力的低落在此不言而喻。當然，選區的劃分可說早已決定華社在大選的處境，選區的劃分使得馬來人為主的選區在數量上遠遠地超越了以華人為主的選區。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以馬來人為主選區占百分之六十，可是到了一九八四年却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四。²⁴

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華人無力干涉選區的劃分，追根究柢，仍然和華社的四分五裂有很大的關係。長久以來，我們都可以聽到有心人不斷借助輿論，呼籲華人團結，對於大部分的華人而言，這是夢寐以求的目標。雖然在中國的歷史上，分是比合多，²⁵但在理論上，團結也並非不可能。

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和保守」一文中指出，中國近百年的變化，一個最大的動力是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力量是成功還是失敗，就是看它用民族情緒到不到家。²⁶基本上，馬來西亞華人也能以民族情緒達到一時的團結，但在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即使華人有因勢利導的機會運用民族情緒，其過程似乎是苦不堪言的。在一九八七年教育部委派不懂華語的教師到華小任高職，這件事引起了華社極大的反響，華社幾乎是一致反對這樣的作法。在同年十月十一日，三個以華人為主的政黨聯同十五華團一起在天后宫開會以商討對策，這種共識和團結在華社幾乎是空前的。這件事却引起了巫統青年團的反擊，在十月十七日召開馬來人大會還以顏色。種族之間的對峙情況極為緊張，大有暴亂之可能。結果政府採取「茅草

註²⁴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參閱 S. Sothi Rachagan, "The Apportionment of Seat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Zakaria Haji Ahmad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註²⁵ 胡基峻先生從春秋時代大約公元前七七〇年算起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發覺合的時間是一一六一年，分的時間達一五一九年，見胡基峻：「統一模式與一國兩制」，陸鏗編，中國統一論叢，香港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頁二七九—二八〇。

註²⁶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年，頁二一七。

行動」(即逮捕)，逮捕了許多所謂「煽動種族情緒者」。²⁷

在種族複雜的環境下，華族知識分子始終驅除不了內心中隱性的壓力，即使他們有大無畏的勇氣、大我情懷，堅持自己的觀點，不怕得罪當權者，但是當他們以行動表示他們的抗議，却常常出現投鼠忌器的苦惱。我們試拿一九九一年初文化城計畫作為一個例子，當林良實宣布馬華公會要建立文化城的時候，立刻引起了巫統秘書長的非議，馬來社會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一時甚囂塵上，馬華公會在馬來人反對之下不得不放棄文化城的計畫。可見許多事情已經和政治處在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深層聯繫。

六、結語

一九八七年的「茅草行動」大逮捕以後，許多人即使沒有噤若寒蟬，其言論恐怕也是極度小心謹慎，華人社會傾向於凡事「解去政治化」(depoliticise)，這大體契合了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醫生所設計的經濟發展藍圖，以經濟發展把社會衝突化解掉。²⁸華社在表面上雖然風平浪靜，但是由於各種族之間的隔膜始終不能徹底消解，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而言，前景未必樂觀，不利華社的條文隨時都可能再度湧現。

殷海光先生說，「知識分子是時代的眼睛，這雙眼睛已經快要失明了，我們要使這雙眼睛光亮起來，照著大家走路。」²⁹這句話對馬來西亞的知識分子無疑一樣是暮鼓晨鐘。目前在新加坡國大政治系執教的何啟良先生在評論謝詩堅的「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時提出了一個疑問：「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是否有『思想』可言？」³⁰單就這一點，知識分子值得反省的地方恐怕就很多了。古人說：「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雖然馬來西亞的問題繁多且複雜，而華族知識分子也一直處在社會的邊緣，難免讓人有悲觀的想法。但是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好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恐怕也是難辭其咎的。劉禹錫的詩說：「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如果有自覺的讀書人能够徹底反省，在失敗中學習，踏實地做一些思想啟蒙的工作，對五百萬的馬來西亞華人在如何安身立命的困境上恐怕還是有它相當大的作用，至少在馬來西亞華人走向二十世紀時能够從容面對「沒有思想」的審判。

註27 參閱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5. 有關「茅草行動」的論述，還

註28 參閱 Aliran, *ISA dan Keselamatan Negara*, Pulau Pinang: Aliran Kesedaran Malaysia, 1988. 有關華社「解去政治化」的討論，參閱張景雲，「華團與政治：解去政治化的前景」，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青年團主辦「當代大馬華人政治研思學術研討會」講稿(即將出版)。

註29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台北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五年，頁六四三。

註30 何啟良，「馬來西亞華人政治分析的幾個問題」，*明報月刊*(香港)，一九八九年四月號，第二十四卷第四期，頁八八。